

王进喜：甘愿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

□ 张保军



王进喜

2019年，在大庆油田发现6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大庆油田广大干部职工、离退休老同志及家属的贺信中指出，“60年来，几代大庆人艰苦创业、接力奋斗，在亘古荒原上建成我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大庆油田的卓越贡献已经镌刻在伟大祖国的历史丰碑上，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位于黑龙江的大庆油田，是继新中国第一座大油田“克拉玛依油田”

被发现后，于1959年9月26日发现的又一个油田。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甩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从这里，走出了一位享誉全国的劳动模范——王进喜。时至今日，以他为突出代表的铁人精神和大庆精神，仍在激励每一位默默无闻的奋战一线的广大石油工人。

王进喜，1923年10月8日出生在甘肃省玉门县赤金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童年苦难的童工生活经历，练就了他刚毅坚韧、倔强不屈的性格。新中国成立后，王进喜通过考试成为

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1956年4月29日，王进喜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部队的大熔炉里，他历任玉门石油管理局钻井队长、大庆油田1205钻井队队长、大庆油田钻井指挥部副指挥，为我国石油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新中国工业战线上一面火红的旗帜。

1958年7月，时任贝乌五队队长的王进喜，在石油工业部组织的劳动竞赛中率先提出了“（钻井进尺）月上千，年上万，祁连山上立标杆”的奋斗目标，并创出了月进尺5009.3米的全局钻井最高纪录。同年，他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出席了全国群英会。

1960年3月，王进喜率领1205钻井队从玉门日夜兼程奔赴大庆参加石油会战。在大庆石油会战期间，他更是以身作则，多次向身边工作人员说道：“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尤其在打第二口井时，钻到约700米时，井场突然发生井喷，但现场没有压井用的重晶石粉。在紧要关头，王进喜不顾腿部受伤，扔掉拐杖，奋不顾身地跳入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最后成功压制了井喷，保住了钻机和油井。事后，房东大娘心疼地说道：“王队长你可真是铁人啊！”“铁人”的名字就是这样渐渐传开的。同年7月，王进喜被树为大庆石油会战的“五面红旗”之一。

1964年年底，王进喜成功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代表工人在大会上做了《用革命精神建好油田》的发言。在发言中，他深情地谈道：“我从小放过牛，知道牛的脾气，牛出力最大，享受最少，我要老老实实地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从北京回来以后，他依然保持谦虚谨慎的习惯，并在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 and 身边的亲人。

1965年，王进喜任钻井指挥部副指挥。他说：“我当了干部，仍然是个钻工”。在现实中，他坚持深入基层，参加生产劳动，并经常去现场解决生产、技术和后勤服务方面的问题。不幸的是，1970年11月15日，由于长期的积劳成疾，患上晚期胃癌的王进喜终因医治无效而离世，年仅47岁。他用葱郁的青春和鲜活的生命实践着自己的人生誓言：“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干好一件事情：快快地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

如今，行走在大庆市，从铁人中学到铁人示范岗，处处都能看到铁人精神绽放的“新的时代光芒”。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回眸

孟子的「仁义美」思想

□ 吉言

孟子（约前390—前305），名轲，邹国人。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儒家美学思想的拓展者，其对孔子的思想有所损益，从本心着手来探讨仁义的存在与人生的价值，并且最终升华了“仁义美”，形成了“仁政”的思想。

从“感官美”到“仁义美”

“口之于味，有同嗜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者皆从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于声，天下期于师旷，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孟子在这段推理过程中着重论述了味觉美，他认为，视觉、听觉、味觉的愉快是并列的、相通的、处于同一层面的。

尽管孟子肯定人的感官愉快，但他又从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出发，认为“目之欲色”“耳之欲声”“口之欲味”等等是做人的“小体”，只是感官的快适，“心之欲仁”才是做人的“大体”，才是真正的乐，因而，相较而言，孟子更重视“仁义美”更注重以人特有之道德心来论人性。所以，在理解孟子的“仁义”、孟子的“性情”时都该回归本心。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仁义内在，人的这种“美”的品质——“仁义”是天生固有的，他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在提出人性善时说：“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仁，人心也。”孟子认为，惻隐之心是人所独有的区别于禽兽的特质，这便是“仁”，而“仁”是天赋予人的最可贵的品质，也是人之为人的安身立命最根本的基础。既然“仁”就是人心，是天赋予的人所固有的善性，它便完全是人的一种内在本质，因此孟子强调对于“仁”，应该是“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顺从人自己内心的本性而不是依照外在的规范去实施仁义。

当然，人所以不善、不美，孟子认为并非天性如此，而是由于外物的引诱。孟子说：“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且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且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牛山之木”本来是美的，只是由于“斧斤伐之”“牛羊食之”，才变为不美的。人性也是如此，人性本来是美的，只是由于外界的影响，才变为不美的。因此，孟子认为人要保持自己固有的“美”，必须进行修心养性，使之不为“斧斤”所伐，以至“放其良心”。所以，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施仁政”：孟子“仁义美”的升华

孟子以天下、道义为本位，具有“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崇高境界和博大情怀，这也奠定了儒家圣坛上一以贯之的道德精神，其“仁义美”的最高境界是施仁政，即建立一个上下和睦、秩序井然的仁政之国。

孟子从战国动荡的社会环境出发，认为施行仁政乃当务之急，其审美理想自然关注百姓的现实生活。对于施行仁政的首要与必要条件，孟子认为是满足经济上的需求。“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的仁政理念，核心是“贵民”，认为社会上的“人民”是最为宝贵的，“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并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把“得其民”看作是帝王“得天下之道”，帝王之得失天下决定于民心的向背，这表现了孟子的政治远见。

在七雄并立、角逐天下的战国时代，孟子的仁政学说首先是对社会现实的针砭和鞭挞。“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殍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其次，孟子认为靠施行仁政来凝聚人心，征讨不仁，将无往而不胜。“贤使能，俊杰在下，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这样的愿景是孟子向往已久的美好蓝图，尽管受时代的局限，这种理想难免沦为乌托邦，但它在后人心中燃起的思想火花，却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希望。

结语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待孟子的“仁义美”思想，其既有积极意义，也有局限性。客观而言，由于受当时社会环境以及孟子本人观念的约束，其局限性是无可避免的。但是，孟子仁义思想的积极启示作用是非常大的。孟子的“仁义美”思想传递了一个理念就是要着眼于万民的忧乐和天下的安危，强调道义本位、社会本位。孟子的“仁义美”思想是以儒家“仁学”和“人性善”为基础，最终升华为“施仁政”，使儒家道德获得了社会性的存在价值。

汤显祖、许地山与粤地文化

□ 李淦林



汤显祖画像（清·叶衍兰绘）



许地山

汤显祖的文化影响

汤显祖（1550—1616）在明万历年间任职徐闻县典史之前，曾绕道澳门，有澳门之游，写有四首有关澳门的七言绝句，他曾在《牡丹亭》一剧中透露了澳门信息：“一领破袈裟，香山奥里巴。多生多宝多菩萨，多多照证光光乍。小生广州府香山奥多宝寺一个主持。这寺原是番鬼们建造，以便迎接收宝官员。兹有钦差苗爷任满，祭宝于多宝寺菩萨前，不免迎接。”

汤显祖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戏曲家，在国际剧坛享有盛誉，其《牡丹亭》乃至“临川四梦”在中国妇孺皆知，在国外也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将汤显祖称为一代文学巨人，不是过誉之词。同时，汤显祖还

有其独特的人生经历，他与英国著名戏剧家莎士比亚卒年几乎同时，因此，许多国际比较文学学者曾将其与莎士比亚进行比较研究。

汤显祖曾在澳门居住，据考证，《牡丹亭》应该就创作于澳门；此外，汤显祖的《牡丹亭》经由旅美台湾作家白先勇改编为“青春版《牡丹亭》”以后在国内外上演不衰，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经典之作。

以上这些都使得汤显祖及其戏剧文化成为丰富的文化宝藏，对于汤显祖的故地徐闻而言，更是可以大力保护开发、活化利用的文化产业资源宝库。

许地山的文学创作

许地山（1894—1941）除著有他那篇著名的散文《落花生》以外，还给人留下了《语体文法大纲》（1921年）、《印度文学》（1930年）、《陈那以前中观派与瑜伽派之因明》（1931年）、《达夷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1931年）、《道教史》（1934年）、《香港与九龙租借地史地探略》（1940年）、《扶箕迷信的研究》（1941年）、《许地山语体文集》（1941年）、《国粹与国学》（1946年）等大量学术著作。许地山对域外的南亚和东南亚风物情有独钟，他曾于1913—1915年间在缅甸仰光任教，后其父、曾任晚清徐闻县知县的许南英（1855—1917）逝世并埋葬于南洋，许地山除了曾赴亦门答腊为父亲扫墓并在目前合影以外，还曾专门赴印度研究印度民间文学、印度哲学、印度宗教与梵文。

许地山的父亲许南英，原居台湾台南，1890年考中清廷进士，1902年任徐闻县知县，在1895年日军侵占台湾时曾率义军抵抗。许南英能诗、善书画，道德文章自律甚严，对子女更是言传身教。许南英晚年居福建时常与施士洁、汪春源、沈秀莹等一起参与厦门菽庄花园主人林尔嘉举办的台湾诗钟活动，现在虽暂时没有发现许地山随其父参加菽庄吟社活动的第一手资料，但从汪春源经常携其子汪受田参加菽庄吟社活动并留有诗文为证的情况看，许南英携同样喜爱文学的爱子许地山共赴吟会，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另外，许地山曾担任位于漳州的福建省立第二师范附小的教师兼主理，而该校即林尔嘉所举办，董事长即为林尔嘉，这可以作为许地山与菽庄主人林尔嘉也有着密切接触的一个佐证。许南英身处宋明理学、乾嘉同光之风浓厚的闽台之地，诗文、治学风格自然深受环境影响，其考镜源流的功力也为时人所推重，这也是他晚年被印富翁张耀轩聘请赴植兰为其书写家传的重要原因。

许地山自幼受教门庭，同时也深受闽台击钵吟诗之风的浸染，其求学功夫自然受其熏陶感染而逐步养成，

其朴学功底自兹生焉，而他后来的文物收集整理、中国服饰的考据研究、中国道教史的爬梳整理，也都显示了他的考证引据功力。这一切的国学功底也与许地山自小所受家学的熏陶，以及在徐闻县由汤显祖创建、许南英任知县时修缮并自任院长的贵生书院中所接受的传统书院教育有着密切关联。

许南英、许地山父子在徐闻县的踪迹仍可从徐闻县的地名和古厝中捕捉到一二，据许地山《窈园先生诗传》所记，“署前街”的“考棚”便是许南英当时的衙署，三官祠便是许地山兄弟的书房。汤显祖、许南英、许地山都在“民风淳朴，社会安定”（许南英语）的徐闻与“淳朴可爱，不喜惹是生非”（汤显祖语）的徐闻百姓一起度过了一段融洽惬意的半岛海滨生活。此种淳朴的民风品格直接影响了许地山的治学品格。许地山为学偏好于精细考证的朴学 and 立足于田野考察的人类学，而这种学问使得许地山将目光关注于民间，同时许地山本身就有搜集民间文献的喜好和习惯，这种爱好和治学路径自然融洽的结合使得对于中外民间文化的研究成为许地山的学术志趣，并形成了独特的治学风格。

喜爱许地山《落花生》《春桃》《缀网劳蛛》等文学作品的读者，可以从其中看出许地山的政治思想与人生态度对其文学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落花生》被编写入中学语文教材后，对学生的影响除了语言文学方面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思想和人生态度方面的影响。其实，许地山的为人处世的态度及其人生态度也对其治学风格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一个学者的性格和人生态度对其治学风格的养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塑造功能。许地山平时就有着孩童一般的天真烂漫的性格，乃至郁达夫曾回忆，许地山常常在与朋友交谈之时，就突然起身到院子里去和幼童们一起“抛皮球，踢毽子”。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许地山兴趣广泛，为人率真正直，想到做到，倾其所有而不遗余力。

结语

与澳门、许地山与香港、汤显祖、许南英、许地山与海外的文化关联线索，为徐闻设计打造完整的“汤显祖”“许南英”“许地山”文化产业链，使徐闻县、湛江市的汤显祖、许南英、许地山文化产品走向世界。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为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台湾内渡作家研究”系列成果之一）

